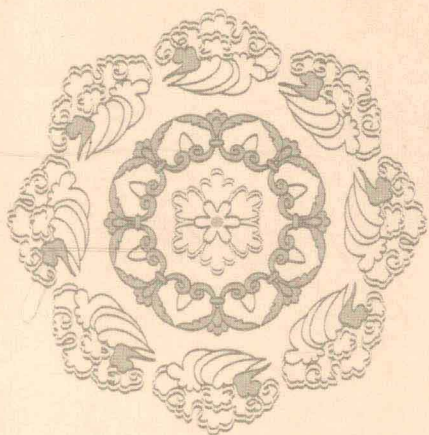


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系列丛书之一



李良品 祝国超 曾超 著

烏江流域

WujiangliuyuMINZUSHI

民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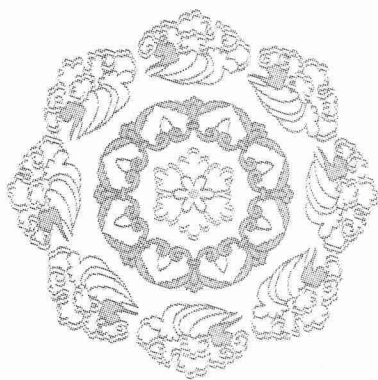
中央文献出版社

李良品 祝国超 曾超 著

烏江流域

WujiangliuyuMINZUSHI

民族史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江流域民族史 / 李良品, 祝国超, 曾超 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5073-2301-6

I. 乌… II. ①李… ②祝… ③曾… III. ①乌江民族史研究 IV.E24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746843 号

乌江流域民族史

著 者/李良品 祝国超 曾超

责任编辑/于俊道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850mm×1168mm 32 开 10.75 印张 275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73-2301-6 定价: 23.8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绪 论

- 一、乌江流域概况 (1)
- 二、民族的概念及特征 (1)
- 三、乌江流域民族史研究的现状及意义 (5)
- 四、乌江流域民族史研究的可行性 (6)
- 五、乌江流域民族史的分期问题 (8)

第一章 概 述

- 第一节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发展历程 (9)
- 第二节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管理 (11)
- 第三节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发展的特点 (13)
- 第四节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人居环境 (17)
- 第五节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及基本情况 ... (30)

第二章 先秦时期乌江流域各族群

- 第一节 乌江流域的原始族群 (43)
- 第二节 先秦时代的三苗 (47)
- 第三节 夏商周时期的巴族部落 (52)
- 第四节 夜郎国的部族 (56)
- 第五节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59)



第三章 秦汉时期乌江流域各民族

- 第一节 秦汉时期乌江流域主要的少数民族 (67)
- 第二节 中央王朝对“西南夷”的经略 (76)
- 第三节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战争 (81)
- 第四节 乌江流域各族内部的社会变化 (86)
- 第五节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91)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乌江流域各民族

- 第一节 乌江流域“大姓”、“夷帅”的发展 (95)
- 第二节 蜀汉对乌江流域各民族的经略 (102)
- 第三节 各民族的演变 (105)

第五章 唐宋时期乌江流域各民族

- 第一节 隋唐两宋时期中央王朝对
乌江流域各民族的经营 (114)
- 第二节 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罗施鬼国) (126)
- 第三节 单一民族的形成 (131)

第六章 元明清时期乌江流域各民族

- 第一节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
乌江流域各民族的经略 (146)
- 第二节 土司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155)
- 第三节 改土归流的实施 (199)
- 第四节 各民族的演变 (211)
- 第五节 各民族的反抗与斗争 (219)

第七章 民国时期乌江流域各民族

第一节 苗族的反抗斗争	(235)
第二节 土家族的反抗斗争	(237)
第三节 仡佬族的反抗斗争	(239)
第四节 彝族的反抗斗争	(240)
第五节 白族的反抗斗争	(242)
第六节 回族的反抗斗争	(242)
 第八章 建国后乌江流域各民族	
第一节 进行社会主义改革	(245)
第二节 设立民族机构	(251)
第三节 落实民族政策	(253)
第四节 培养民族干部	(261)
第五节 振兴民族经济	(262)
第六节 开发和保护民族文化	(266)
第七节 发展民族教育	(269)
 附录: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大事记	(276)
主要参考文献	(328)
后 记	(333)

绪 论

一、乌江流域概况

云贵高原的乌蒙山下,石缸洞中,孕育了一条神秘的乌江。她由西向东流至贵州思南,再由南转北,注入长江。古代的乌江,有诸多别称——巴江、夜郎水、延江、黔江、枳江、涪水。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有南北两源,南源三岔河,北源六冲河,习惯上以南源三岔河为乌江之源。三岔河发源于云贵高原乌蒙山脉东麓的威宁县盐仓镇营洞村石缸洞,海拔2260米。乌江干支流流经云南、贵州、湖北、重庆4省市,55个区、县(包括自治县、市),在重庆市涪陵城东汇入长江,全长1050公里。乌江蜿蜒曲折,兼纳百川,沿途接纳许多支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系。

乌江流域在贵州省境内有威宁、赫章、水城、六盘水、纳雍、安顺、关岭、镇宁、普定、平坝、织金、清镇、毕节、大方、黔西、贵阳、修文、金沙、息烽、桐梓、遵义市、遵义县、开阳、都匀、黄平、瓮安、湄潭、余庆、凤冈、石阡、思南、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龙里、贵定、福泉、施秉、镇远、务川、正安、道真、绥阳等44个县(市、县);在重庆市境内有秀山、酉阳、黔江、彭水、石柱、南川、武隆、涪陵等8个县(自治县、区、市);在湖北省境内有咸丰、利川、恩施等3个县(市);在云南省的有镇雄县。乌江傍河的县城有思南、沿河、彭水、武隆、涪陵。乌江沿岸的小镇有贵州的乌江镇、文家店镇、邵家桥镇、潮砥镇、洪渡镇;重庆的龚滩镇、江口镇、羊角碛、白马镇、白涛镇。

二、民族的概念及特征

(一)民族的概念

在古希腊时就有“民族”这个概念产生,在《荷马诗史》中就有



“民族”这一词。在公元五世纪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开始探讨民族特征问题。他在《历史》一书中大约有两百多处使用了民族一词。他认为民族与“地域、语言、性格、风俗、宗教”有关。

在中国古代的民族概念最主要的是“族类”。民族一词不具体指个人和族体,而是分开使用的。南朝宋齐时期道士顾欢的《夷夏论》中即有“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这是“民族”一词在汉语文献中目前所见最早的使用例证。

在近代,很多名人对“民族”一词的概念均有自己的看法。孙中山先生认为构成民族有“五种巨大的力”,其中最大的力是“血统”,其次是“生活”,第三是“语言”,第四是“宗教”,第五是“风俗习惯”,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不是武力征服得来的。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写《说民族学》一文时,认为民族的特征是“血系、语言、住所、习惯、宗教、精神体系”。

而当前人们在解释“民族”这个概念时,大多采用斯大林的解释。斯大林1912年底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概念:“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929年,他在《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一文中,又进一步补充、修订了早年提出的民族概念:“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

(二)民族的特征

1、共同地域。指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长期共同生活和居住,并赖以发生内部联系的一定地域。这是一个民族生存所必需的地理环境和空间条件。共同地域是民族形成的首要条件,没有共同地域,民族就不可能形成。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不是世代稳定的居住在一起,没有一个共同生活的共同地域,要

形成民族是不可能的。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共同地域,如土家族居住在武陵山区。当然,由于历史上民族的迁徙和流动,出现了聚居、杂居、散居等不同的民族分布情况,因而现实生活中居住在同一个地区的人们不一定就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全部居住在一起。因此,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是大分散,小集中,但又各有特点,情况不一,这也是历史长期形成的。我国有一些民族所分布的共同地域比较分散,由两个或以上的或大或小的聚居区组成,这些聚居区或位于同一省内,在地域上不相连接,或省区不同、地域也不连接或地域上大体相连接,如贵州的彝族、四川的彝族;分布在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的苗族、瑶族、侗族、布依族等。这种情况也就形成了乌江流域当前多个民族居住的现状。

2、共同语言。指同一民族的人们所共同使用的语言,它是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当中彼此之间交往联系中逐渐形成的。共同语言是指民众的口头语言,而不是书面语言。在民族形成的初期,往往是一个民族操一种语言,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各民族之间的分化和融合,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不同的民族操同一种语言或同一民族操两三种不同语言的现象。

3、共同经济生活。共同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指同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经济上的联系性,即不可分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它是一个民族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具体的讲,组织形式指的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生产过程的组合方式、劳动成果的分配与交换方式;行为方式则主要指的是生产劳动、经营活动和消费的方式。因此,共同经济生活不仅包括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包括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即指生产方式,也指生活方式。它和社会经济结构 and 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不等同于社会经济结构 and 经济制度。各民族由于具有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文化基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各民族之间交往的扩大,先进民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往往会影响后进民族,使得各民族的经济生活出现日渐趋同的现象。

4. 共同文化与共同心理素质。共同文化是指同一民族的人们之间所具有的共同历史渊源、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这些内容明显地构成了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是民族的主要特征。共同心理素质则指通过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性格,民族感情,以及在民族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自我意识。民族性格是指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在心理、思维、行为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和气质。常常通过民族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使人感觉得到。而民族感情和民族自我意识则是建立在各个民族居住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生活条件和历史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受到族际关系的制约,因而强调共同起源和反映共同利益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首先是一种民族内部的认同心理,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由这种民族认同心理上升而来的自尊、自信、自强的观念和热爱本民族的强烈感情,是共同心理素质的核心。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民族构成要素和民族特征中最持久、最有生命力的方面,是维系一个民族强有力的精神纽带。

民族之所以是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就因为它具有上述四个共同特征。但是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和民族自身形成发展的原因,这些特征在每个民族中的表现程度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只有坚持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民族定义的普遍原理和某一民族形成及其特征的具体表现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正如斯大林所说的:“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在把各民族拿来作比较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得有时是这个特征(民族性格),有时是那个特征(语言),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地域、经济条件),民族是由所有这些特征结合而成的。”

三、乌江流域民族史研究的现状及意义

乌江流域总人口达3345.02万,其中少数民族1066.43万,占总人口的31.88%。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学界和民族学界十分注重对西藏、西南、西北、东北等地民族史的研究,对乌江流域民族史的研究则非常薄弱。乌江流域由于历史的缘故和地理位置的偏僻,加之交通不便,这里历来是蛮荒之地,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然而,对乌江流域民族史的研究,政治学界、社会学界、民族学界几乎无人问津,成了被理论界和学术界遗忘的“死角”。近年来虽有一些社会学、民族学的专家学者撰写了《中国西南民族史》、《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重庆民族史》、《湖北民族史》和《西南通史》,但这些研究专著既未把乌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又未将乌江流域民族发展问题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研究,故显得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鉴于此,组织一批具有学术研究思想、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高校教师来撰写一部跨省市、跨区域的《乌江流域民族史》,就显得极为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讲,乌江流域的民族发展史始终影响着乌江流域历史发展的进程,并成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核心问题。只要我们翻检乌江流域的历代府县志,就会清楚地发现,乌江流域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围绕着民族问题展开的,并导致政局的演变,给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各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史,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乌江流域的历史,而且还可以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具体来讲,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史的意义有六:一是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发展的过程,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的不同特点,有利于探寻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发展的规律;二是通过翔实的资料,客观公正地叙述乌江流域民族发展的事实,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的自尊心,也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三是研究该地区民族发展史,有利于探寻乌江流域乃至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变迁规律,提出建设民族地区和



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及民族区域自治的对策；四是较系统地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史，不仅有利于宣传乌江流域、介绍乌江流域、让更多的人关注乌江流域，而且有利于吸引外商到乌江流域投资，发展该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五是乌江流域民族发展的问题，是涉及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重大问题，研究该地区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并提出一些可供政府有关部门决策参考的建议，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加快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步伐，早日实现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总体目标；六是撰写出一部《乌江流域民族史》专著，不仅可以填补乌江流域民族发展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也能今天党和国家治理和开发西南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宝贵的借鉴经验，从而更好地维护西南边疆稳定、加强民族团结，加快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四、乌江流域民族史研究的可行性

乌江流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讲乌江流域的历史自然离不开乌江流域民族史，当然，民族史也不是孤立的，如果它不以乌江流域历史为背景进行研究，许多问题也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研究乌江流域地方史必须十分重视民族史，抛开民族史来讲乌江流域史是不科学、不全面、不应当的。但是，乌江流域民族史毕竟不同于乌江流域史。它主要是研究乌江流域内各民族的源流及其历史发展，侧重于民族，对其他的问题只作简单的勾勒。乌江流域民族史当然要借助族别史如土家族史、苗族史、彝族史、布依族史、侗族史、仡佬族史的材料，但它与族别史有两点不同：第一，它不是单个地研究这些民族，而是把乌江流域内的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第二，它的空间范围是乌江流域，这些民族流域外的有关情况只是在必要时才涉及。

长江师范学院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是人才资源优势。我校有40%的教师来自渝东南8个区县，另有30%左右的教师在涪陵师范学院工作十年以上。我校招收的

学生有40%来自乌江流域,毕业的学生大部分已经成为这个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我校师生员工对乌江流域的情况十分熟悉,具有深厚的“乌江情结”。我校“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有专、兼职研究人员29名,其中有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5名、教授17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包括在读)14名,下设三个研究方向,科研力量比较雄厚,队伍结构比较合理。

二是科学研究优势。我校是乌江下游唯一的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是乌江给予了我们以灵性和智慧,是乌江之水孕育着我们,是乌江流域的父老乡亲始终如一地支持着我们。我校对研究乌江、开发乌江、建设乌江有着更多的关切和期待。我校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是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早已大张旗鼓地开展乌江流域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的研究,并有“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等5个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140多个省市级、校级项目。近五年来,专兼职研究人员出版《乌江经济文化研究》、《二十五史西南地区土司史料辑录》、《重庆土家族民俗文化概论》、《巴人尚武精神研究》、《涪陵历史文化研究》、《乌江流域民族民间音乐教程》、《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等专(编)著20多部,在《历史研究》、《文学遗产》、《贵州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教育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

三是文献资料优势。2002—2006年,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先后有30多次深入乌江流域考察,收集了乌江流域50多个市、区、县的地方志达300余册;现有乌江流域历史、民族、民俗、文学、经济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资料累计5000余册;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包括《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嘉庆《四川通志》等抢救性文献资料200余册。目前已建成全国唯一的研究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的文献资料库,资料库中除拥有中文图书文献资料5000余册外,还有中文刊物42种和一定数量的音像、图片、考察报告等原始资料,尤其是民族类的文献资料比较丰富。



四是学科建设优势。近年来,我校已在有关系院本科生中开设了“民族学”、“民族理论与政策”、“西南民族史”、“乌江文化概论”、“民族民间文学”、“民族民间艺术”等课程,“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下属的“乌江流域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室”在未来的三至五年中,除进一步完善这些课程内容,还将开设“土家族研究”、“西南土司文化研究”等特色课程,并初步形成我校“民族史学”的课程体系。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史不可或缺的有利条件。

五、乌江流域民族史的分期问题

民族史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它概括了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源流,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因此,正确认识民族历史,最要紧的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从本质上看,民族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它深受社会制度的制约,这就是说,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有一定的民族发展史。概而言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民族史,都以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为其基本特征;反之,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史,则是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为基本特征。正基于此,研究民族史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制度、阶级关系和民族政策进行综合考察。

因此,乌江流域民族史的分期就是以古老民族——西南夷——“大姓”、“夷帅”——单一民族逐渐形成——民族的演变——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历程来分期的。这种分期真实地反映了乌江流域民族发展历史的全貌。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发展历程

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其主要少数民族大抵渊源于古代的百濮、氐羌、南蛮、百越四大族系。先秦时期,乌江中上游主要是仡佬族的先民——濮人聚居,下游为土家族的先民——巴人聚居;秦汉至清,汉、彝、苗、布依、侗、水、回等民族不断进入乌江流域;解放以后,又有朝鲜、藏、维吾尔、纳西等族陆续迁入,因此,该地区有汉族及4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在这里,成为西南地区民族融合的结合部。

乌江流域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样一种多民族聚居杂处的状况呢?这无疑与乌江流域的地理位置及中国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

乌江流域地处祖国西南边疆,西接云南,北连四川,东与湖广为邻,南与贵州南部及广西相连,可谓是西南地区的腹心地带。这里山重水复,形势险要,历来是中央王朝鞭长莫及的边地,流域内民族多与邻省连接成片,关系密切。

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今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秦汉以来,百濮、氐羌、南蛮、百越四大族系发生变动,濮人渐次衰落,氐羌、苗瑶及百越民族涌向地广人稀的乌江流域山区,从而使乌江流域成为西南四大族系交会的结合点。自唐蒙通夜郎以来,汉朝屡次对“南夷”用兵,灭且兰,伐夜郎、漏卧,其后又有李特“引僚入蜀”,濮人大挫,趋于衰落。氐羌族系中的昆明各部,汉晋以来日渐强大,后来不断沿乌蒙山东进,到了唐代,南诏兴起,其势力



更达于整个乌江流域西部。苗族原住江西、湖南一带,自秦汉以来,王朝势力不断深入,迫使苗族西迁,至五溪而称“五溪蛮”,逐步逼近黔东。东汉马援伐五溪,苗族再次西迁,沿苗岭而深入乌江流域腹地,遍布山谷。

与此同时,汉族渐次移入乌江流域。庄蹻入滇、秦开五尺道,乌江流域与外地渐有交通。汉武帝开“南夷”,巴蜀之民随军屯驻,源源进入,龙、傅、董、尹、赵、谢等望族日渐兴盛而成“牂牁大姓”,魏晋时独霸牂牁各郡。唐宋时期,王朝统治西南边疆的据点逐渐扩大,控制了乌江以北地区,汉族移入乌江中游者日众。元代大兴“站赤”,驿道相继开通,乌江流域与川、鄂、滇、黔连成一片。明洪武年间,在贵州建立卫所,数十万屯军纷至沓来,使商屯、民屯应运而生。直到清初仍是“夷多汉少”。清朝在乌江流域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后,汉族人口大量迁入,自此以后,乌江流域逐渐形成“汉多夷少”的局面。

从乌江流域民族发展来看,汉族自北而南,氐羌民族自西而东,苗瑶民族自东而西,百越民族自南而北,他们从四方八面进入乌江流域,相互对流,相互穿插,逐渐形成“又杂居,又聚居”的分布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分化过程加剧,分别形成了今天的各民族。汉晋时期,彝族首先从氐羌中分出,由“乌蛮”逐渐演变成为“罗罗”。而百越族系在唐宋时由“没夷”、“夷子”发展成为“西南五姓蕃”或称“仲家”,形成了今天的布依族。而历史上的“仡伶”、“峒人”,演化成为今天的侗族;而唐代居住在乌江流域的“仡佬”、“佶佬”或“葛僚”,发展成为当今的“仡佬族”。苗族和瑶族,大抵是在唐宋时期逐渐分开为现在的两个民族。同属于氐羌族系的“廛君蛮”、“板楯蛮”者,散布在川、鄂、湘、黔毗连地区,逐渐形成土家族。^①

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按其语言系统分,均属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操藏缅语的民族,如藏族、彝族、傈僳族、白族、纳西族、羌族等,均出自古代的氐羌族系,古称“氏类”;

①侯绍庄等《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页。

操侗壮语的民族,如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族、水族、毛南族、仡佬族等,均出自百越族系,古称“越人”;操苗瑶语的民族,如苗族、瑶族、畲族,皆出自苗瑶族系,古称“南蛮”;另有一支为百濮族系,其语言亲属至今不明,如仡佬族、𡵓人、羿子、木佬等,古称“濮人”。

第二节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管理

在我国历史上,一方面是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特别发达,中央王朝总是力图把所有的少数民族纳入版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王朝的兴衰势必要直接影响少数民族的发展;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也建立过许多政权,它们有时与中央王朝联合,有时又与之斗争,有时臣服,有时对峙,有时甚至取而代之。乌江流域虽然地处西南边陲,但很早就与中原有所联系,秦汉以来逐步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乌江流域历史的发展,深受中国历史发展的制约,特别是受四川、云南、湖北三省影响较深。

乌江流域虽然远离中原,山重水复,信息闭塞,民族复杂,其历史发展在许多方面又与内地有所不同,显示了它的地方特点、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因此,历代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进行有效管理时又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举措。例如,汉代在乌江流域虽已设立郡县,但边郡与内郡有明显区别;唐末又置州县,但边州毕竟不同于正州。元代开始在乌江流域设置土司,直到清初仍然是土流并治,“改土归流”后也还残存着若干土司。由此可见,乌江流域民族历史的发展有其特殊性、复杂性,所以在管理方面也具有特殊性。

历代封建王朝对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管理,其具体措施表现为“土流并治”。土流并治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一大特征,是封建王朝借以实现对多民族国家进行统治的基本国策。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实行土流并治,以流官统治为基础,以土官统治为补充,